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2007 年英联邦作家奖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2007

2007 年布克小说奖最后入围

Shortlisted for the Man Booker Prize 2007

人民文学出版社

"As compelling as a fairytale—beautiful, shocking and profound."

[新西兰] 劳埃德·琼斯 著

石 青 译

Lloyd Jones

Mister Pip

皮普先生

101045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2007 年英联邦作家奖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2007

2007 年布克小说奖最后入围

Shortlisted for the Man Booker Prize 2007

Mister Pip 皮普先生

Lloyd Jones

[新西兰] 劳埃德·琼斯 著
石 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ister Pip
Lloyd Jones

Copyright © Lloyd Jones 2006
First published by The Text Publishing Co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Text Publishing Company Pt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根据 Text Publishing Melbourne Australia 200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皮普先生/(新西兰)琼斯著;石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10

(当代外国获奖小说)

ISBN 978-7-02-006860-9

I. 皮… II. ①琼…②石… III. 长篇小说—新西兰—现代
IV. I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4474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王景林

皮普先生
〔新西兰〕琼斯 著
石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2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1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860-9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布干维尔岛——西南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那里曾经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年产量高达十八万吨铜和十五吨黄金。该矿由澳大利亚布干维尔铜业有限公司所拥有。岛上的居民大部分从事铜矿生产。因为受到分离叛乱分子的袭击,该矿于一九八九年关闭。为了使叛军屈服,一九九〇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撤走了岛上所有的白人,对该岛实施经济封锁,并派兵镇压,酿成了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至此岛上的居民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远大前程》——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最伟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英国,讲的是失去父母的孤儿皮普成为一个幸运儿,有着所谓的远大前程,但是当从天而降的运气烟消云散后,他所追求的远大前程也以幻灭而告终。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皮普终于明白了应该怎样去寻求自己的幸福,懂得了友谊的珍贵,明了了爱情的意义,最终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操守的真正的绅士。

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布干维尔岛,沼泽地与热带渔村,将时空上、地理上如此遥远的两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

是瓦兹先生。而将皮普和玛蒂尔达——白人男孩和黑人女孩——联系在一起的是瓦兹先生带给孩子们的《远大前程》。

瓦兹先生是留在岛上的惟一的白人。当学校的老师都撤走以后,他主动承担起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他相信文学的力量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可以使人的精神获得解放,于是他将狄更斯先生和《远大前程》介绍给岛上的孩子们,希望通过文学帮助孩子们度过苦难的战争岁月。他每天给他的学生读一个章节,一共读了五十九天。就在政府军和叛军拼力厮杀时,瓦兹先生把他的学生带进了“一片更大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结满白霜的早晨、沼泽地、铁匠铺、大都市、高楼,还有阶级。在布干维尔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瓦兹先生撒下的文化种子扎下了根,并且开出了花,结下了果。

为我们讲述《皮普先生》这个故事的是海岛上的一个黑人女孩,她叫玛蒂尔达。她几乎不识字,但是她用耳朵结识了一个新朋友,那就是《远大前程》里的孤儿皮普。狄更斯小说里的皮普给了年轻的玛蒂尔达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她发现,她和虚构的皮普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对她而言,比起她那些死去的祖先来,皮普显得更真实,更亲切。她与皮普的交流虽然是单向的,但是这样的交流影响了她的一生。同时,在经历了道德观念的混乱之后,是文学告诉了她做人的道德准则:爱,忠诚和良心。

除了上面那些严肃的话题以外,在玛蒂尔达给我们讲述的《皮普先生》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充满异国情调的热带海岛的美丽风光。我们和岛上的孩子们一起听妈妈奶奶们给我们讲倒地铃的故事,蓝颜色的故事,军舰鸟的故事,草席的故

事,当然还有魔鬼的故事。我们还和孩子们一起聆听了玛蒂尔达妈妈的谆谆教诲:信仰像氧气,要为生活中的动乱储备信仰;梳辫子的女孩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女孩子梳辫子是为了赶走男孩子。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哈哈大笑,暂时忘却了战争。

《皮普先生》的作者是新西兰的劳埃德·琼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内战期间,他作为记者曾经去实地采访过,所以对战争带给人们的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他用优美的笔触画出了一座美丽而清新的海岛,也用幽默的笔触描绘了远离文明的海岛上的一群善良而又愚昧的大人孩子,但是他也随即把战争带来的残酷血淋淋地展示在我们的眼前。他让我们感动,他让我们震撼,他也让我们思索。

当你读完了这篇难忘的、有趣的故事以后,你也许会想要重读狄更斯先生的《远大前程》,从中再次体会皮普成长为绅士的心路历程。我已经重新读了一遍,为了中文版的《皮普先生》,也为了我自己。

译者

二〇〇八年十月

1

大家都叫他“泡泡眼”。那时候就连我这个骨瘦如柴的十三岁女孩都能猜得出来，他大概知道他的这个绰号，只是他不在乎罢了。他的两只眼睛只对眼前的东西感兴趣，根本不注意我们这些光着脚丫子的孩子。

他像是见到过，或者是知道了太多的苦难，而且忘不掉那些深重的苦难。长在他的大头上的那双大眼睛比任何人的眼睛更突出——好像它们想要离开他的脸。这双眼睛让你想到某个无法尽快夺门而逃的人。

“泡泡眼”每天都穿着一身白色亚麻布的上衣和裤子。在潮湿而又炎热的天气里，他的裤子粘在了关节突出的膝盖上。他有时候会戴上一个小丑的红鼻子。他的鼻子够大的了，不需要那个红灯泡。但是出于我们想不出来的原因，他在特定的日子里戴上红鼻子，对他来说也许有什么含义吧。我们从来没见他笑过。在他戴上红鼻子的那几天，你会调转视线，因为你实在没法对视那么忧伤的一张脸。

他用一根绳子拉着一辆手推车，“泡泡眼”太太站在手推车里，看上去像个冰皇后。在我们岛上，几乎每一个女人的头

发都是弯弯曲曲的,只有格雷斯把她的头发弄直了,高高地堆在头顶上,权当皇冠了。她看上去非常得意,好像不知道自己还光着脚。当你看到她那个巨大的屁股时,你就会担心马桶的座圈,你就会想到她的母亲,想到她的血统,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下午两点半,鹦鹉们藏在树阴里,看着树下面的一个人类的身影,那影子比先前见到过的要长出三分之一来。这只是两个人的身影,然而感觉却像是一支队伍,那是“泡泡眼”先生和“泡泡眼”太太。

年纪小一点的孩子看到了机会,他们跟在手推车后面。我们的父母把脸转了过去。他们宁可看一群蚂蚁搬运一只烂掉的巴婆果。有些人站在一边,手里握着无用的大砍刀,等着这支队伍走过去。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白皮肤的男人拖着一个黑皮肤的女人。他们看到了鹦鹉们看到的场景,看到了狗儿们看到的场景,狗儿们坐在自己瘦骨嶙峋的屁股上,张开大嘴狠狠地朝在它们眼前飞来飞去的蚊子咬下去。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孩子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能听见大人们聊天的只言片语。瓦兹太太笨得像头鹅。而瓦兹先生正在为过去犯下的错误受到惩罚。也许这是一次打赌的结果。瓦兹先生和瓦兹太太的组合说明了我们的这个世界有一点变幻无常,不过这个世界在其他方面倒都是千篇一律的。

“泡泡眼”太太撑着一把蓝色的阳伞,遮住了头顶上的太阳光。我们听说,这是整个岛上仅有的一把阳伞。我们没有去打听我们见过的那些黑色的雨伞,更不用说会去问这样的

问题：那些黑色的雨伞和这把阳伞有什么区别？不是我们很在意自己看起来是不是很笨，而是因为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太认真的话，可能会把一件非常稀罕的东西变得平淡无奇。我们喜欢这个词——阳伞——我们不打算只是因为某个愚蠢透顶的问题而失去它。我们也知道，不管是谁问这样的问题都会挨一顿揍的，活该。

他们没有孩子，要是有的话，那么他们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住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是在美国，或者是在澳大利亚，或者是在英国。他们俩是有名字的。她叫格雷斯，皮肤和我们一样是黑的。他叫汤姆·克里斯琴·瓦兹，皮肤和你的眼白一样是白的，只是比眼白还要白。

教堂墓地的墓碑上有一些英国人的名字。有个住在岛子另一边的医生，尽管也像我们一样是黑人，但他却有一个完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名字。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泡泡眼”的绰号，但我们常常叫他“瓦兹先生”，因为在我们这个岛上就剩下这么一个英国人的名字了。

他们单独住在牧师的老房子里，从大路上是看不到那栋房子的。听我妈妈说，过去那房子的四周是一片草地，可是牧师死后，当局忘了传教这一回事了，除草机都生锈了。很快，灌木丛就包围了那栋房子，到我出生的时候，“泡泡眼”夫妇就已经淹没在灌木丛中，从众人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当“泡泡眼”像一匹围着井台转悠的疲惫不堪的老马，拉着手推车里的妻子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他们。手推车的四周围着一圈竹栏杆，“泡泡眼”太太把两只手搁在栏杆上。

为了炫耀，就需要有观众。可是“泡泡眼”太太没有注意

我们,不值得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好像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我们不那么在乎,因为瓦兹先生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由于“泡泡眼”是方圆几英里内惟一的白人,年纪小的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直看到他们手里的冰块融化了,冰水滴到了黑色的小手上。年纪大一点的孩子会屏住呼吸,敲开他家的门,请求以他为模特做学校的课外作业,可是当门打开后,有些孩子只会瞪着眼睛愣在那里。我知道,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孩被邀请进到屋子里去,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邀请的。那女孩说,他们家里到处都是书。她请他谈谈他的生活。她坐在一张椅子上,边上是一杯他为她倒的水。她手里握着一支铅笔,翻开笔记本。他说:“亲爱的,我已经活了很多很多年了。我期待着再多过几年这样的日子。”她记下了这句话。她把笔记本拿给老师看,老师夸奖了她的积极主动。她还把笔记本带到我家,给我和妈妈看,所以我知道这件事。

对我们来说,不是因为“泡泡眼”是最后一个白人,就使得他成为了大部分神秘事情的起因,而是他也证实了我们认定的一些事情是正确的。

我们相信,重要的东西都是白颜色的,比如冰激凌,阿司匹林药片,缎带,月亮,星星。在我祖父那个年代,白色的星星和白色的圆月比现在显得更重要,现在我们有发电机了。

当我们的祖先看到第一个白人的时候,他们以为看到的是鬼,或者是一些倒霉的人。狗儿们蹲坐在地上,张开大嘴,等着看西洋镜。它们还以为遇到了难得一见的乐事儿。这些白人也许会向后跳,也许会一个跟斗翻过树去。狗儿们也许会得到一些吃剩下的食物。它们总是惦着吃的东西。

我祖父看到的第一个白人是驾驶快艇的，他遭遇了海难。他向祖父要指南针，祖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于是他知道祖父没有指南针。我想像着，祖父把双手背在身后，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不想显出很蠢的样子来。那个白人又要一张地图。祖父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于是指着那个人受伤的脚。祖父感到很奇怪，鲨鱼怎么会漏掉这个诱饵。那个白人问在哪里洗脸洗手。祖父终于能帮上忙了，他说这是一个海岛。那个白人问，这个岛是不是有个名字。祖父用意思是“岛”的那个字来回答他的问题。当那个白人问到最近的商店该怎么走的时候，祖父突然大笑起来。他向上指着一棵椰子树，然后又越过那个白人的肩膀，指着他身后的大海，那是他来的地方。祖父的意思是，浩瀚的大海里有的是鱼。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故事。

除了“泡泡眼”——或者应该叫瓦兹先生——和一些澳大利亚的矿工，我几乎没有见过其他活生生的白人。我在一部旧录像片里见到过几个白人。我们是在学校里看的这部片子，讲的是很多年以前一个什么公爵来访问的事情，大概是在一九几几年。摄影机一直盯着那个公爵，没有声音。我们看着那个公爵吃饭。公爵和其他的白人都留着小胡子，穿着白颜色的裤子。他们甚至还穿着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短上衣。他们不擅长坐在地上。他们蹲着，但又蹲不住，总是摔倒在地上。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那些白人试图像坐在椅子上那样坐在地上。有人递给他们包在香蕉叶子裡的猪蹄。可以看见一个戴着钢盔的白人要什么东西，直到有人给了他一块白布，我们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用那块白布擦了擦嘴，我们摇

头晃脑地哄堂大笑。

不过,我主要是在看我的祖父。他是那群瘦骨嶙峋的孩子中的一员。他们都光着脚,穿着白色的背心,排着队走过来。在那些戴着钢盔、啃着猪蹄的白人面前,孩子们跪在地上,用他们的身体叠成一个金字塔,祖父是在这个金字塔最上面的第二层。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观后感,可是我不知道这部片子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写了我的祖父,以及他告诉我的那个故事:一个遭遇了海难的白人,像海星一样被大浪冲到村子前面的海滩上,祖父发现了他。在那个年代,村子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不知道莫斯科,不知道朗姆酒,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此刻我要说的话,我想,都缘于我们对外面的世界缺乏认识。我妈妈只知道牧师在布道和谈话时告诉她的有些事情。她会背乘法口诀表,知道一些外国首都的名字。她听说人已经飞到月亮上去了,对这样的故事她不太相信。她不喜欢自吹自擂。她更不喜欢有被人愚弄的感觉。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布干维尔岛。我记得,在我八岁生日那天,我跑去问她的年龄。她飞快地把脸掉转开,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我让她感到尴尬了。

她尖刻地反问道:“你觉得我多大了?”

我十一岁那年,父亲突然搭乘矿里的飞机,离开了我们。不过在他离开之前,他被邀请到学校来观看他要去的那个国家的电影。在那些电影里,冲茶时先把牛奶倒进杯子里,然后

再把茶水倒进去。可是吃玉米片时,牛奶则是后倒进碗里。妈妈说,她和我父亲为先倒牛奶还是后倒牛奶吵了起来,就像两只好斗的公鸡吵得不可开交。

有时候,我看到她很伤心的样子,我知道她在回想那次吵架的事。不管正在做着什么,她都会抬起头来说:“也许我应该闭上嘴的。我太争强好胜了。你说是吗,丫头?”只有很少的那么几次,她对我的看法表示出兴趣来。不过,对于像她的年纪有多大了这样的问题,我知道该说什么话会让她高兴。

父亲在学校里还看了其他的电影。他看到了小汽车、大卡车、飞机。当他看到高速公路时,变得兴奋不已。接着电影里示范了如何穿过人行横道线。你得等一个穿着白色外衣的男孩子举起一块上面写着“停止!”字样的牌子,然后才可以过马路。

父亲心动了。那里有许许多多的马路,而那些穿着白色外衣、举着牌子的小孩子有控制交通的权力。为此爸爸妈妈又吵了起来。妈妈说,我们这里和那里没什么不同。你不能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如果你随便乱走,就会挨到一记耳光。因为,她说,《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你也许知道天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利进入天堂。

我们珍藏着父亲从汤斯维尔寄来的明信片。他在明信片里说,当飞机钻入云层的那一刻,他生平第一次从高空往下看,看到了我们生活的地方。在空中,他惊讶地看到,我们的布干维尔岛比一块牛油大不了多少。飞机越过大海,眼前出现的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峰。可是妈妈不在乎父亲说的这些事情。妈妈想要知道的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工资袋。

一个月以后，我们收到了第二张明信片。他说，工资袋多得就像面包果。我们决定去找他。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弗朗西斯·奥纳和他的叛军向铜矿宣战，矿业公司把莫尔兹比港的红皮肤兵带到了我们的岛上。那个时候，我有点不太明白，照莫尔兹比港的说法，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可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和他们不同，我们的皮肤就像夜晚一样黑，而那些士兵看上去像是从红土里过滤出来的，这就是他们被称为红种人的原因。

和战争的消息一起到来的还有传闻。而谣言是传闻的情妇。谣言，你可以相信它，也可以不理睬它。我们听说，没有人可以进出布干维尔岛。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能封锁一个国家呢？你拿什么把它捆起来，或者包起来？我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这时候红种人的兵到了，我们领教了什么是封锁。

我们的四周环绕着大海，红种人的军舰沿着海岸线巡逻，他们的直升飞机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没有报纸，也没有电台，我们只好依赖传闻了。红种人打算围住我们的岛，迫使叛军屈服。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消息。“祝他们走运，”妈妈说。我们就在乎这么多。我们有鱼。我们有鸡。我们有水果。我们有我们永远拥有的东西。除此之外，叛军的支持者可以再加一句：“我们有尊严。”

一天晚上，电灯不亮了。发电机没有燃料了。我们听说，叛军闯进了位于海岸线南端的阿拉瓦的医院，抢走了所有的医药用品。这个消息真的让我们的妈妈们忧心忡忡。不久，年纪最小的孩子们染上了疟疾，但没有东西可以救他们。我

们掩埋了他们的尸体,把哭哭啼啼的母亲们从小小的坟堆前拉走。

我们这些孩子围在妈妈们的身旁。我们在菜园子里帮妈妈们干活。我们坐在几百英尺高的大树下聊天。我们在小河里玩耍,那些小河翻滚着从陡峭的山坡上一泻而下。我们发现了新的水塘,那是我们的镜子,照出了我们被水面上泛起的层层涟漪弄皱了的调皮捣蛋的脸。我们在大海里游泳,阳光把我们的黑皮肤晒得更黑了。

我们的老师乘坐最后一艘船去了拉包尔港,我们就不再去上学了。最后一艘船。这句话让我们心灰意冷。我们现在得蹚着水才能离开海岛。

“泡泡眼”有机会离开,可是他没有走,大家都感到很惊讶。尽管瓦兹太太是当地人,他还是可以把她带走的。其他的白人都带走了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当然啦,他们是矿业公司的人。

没有人知道“泡泡眼”是干什么的。据我们所知,他不工作。大多数时间里是看不到他的。

我们的房子在海滩上稀稀拉拉地排成一行,所有的房子都面对着大海。房门和窗户总是敞开着,所以很容易听见邻居们的闲谈。没有人听到过瓦兹夫妇聊天,因为我们这三十多所房子和他们居住的牧师的老房子相隔很远。

有时候你会在海滩的一头看见瓦兹先生,或者瞥见他的背影,于是你就会感到纳闷,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还有他们俩组成的那支奇特的队伍。瓦兹夫妇会在学校附近出现,当他们走到第一户人家时,公鸡母鸡都会溜达出来迎接他们,

走过最后一户人家后，瓦兹先生就拖着他的妻子穿过高低不平的草地，经过猪圈，朝灌木丛走去。我们坐在树上，等着他们从我们悬空吊着的脚下走过去。我们希望他能停下来喘口气，和瓦兹太太说一句话，因为没有人见过他们在一起像丈夫和妻子那样说话。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引起瓦兹太太的注意，你说的事情得是重要的，甚至是极其重要的才行。

认定瓦兹太太疯了，这是很容易的。不过，瓦兹先生却是个谜，因为他来自一个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的世界。妈妈说，他部落里的人已经把他忘了。他们是不会把自己人丢下的。

在学校关闭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学校对我的生活有那么大的影响。我的时间感来自学校的日程表——学期开始，学期结束，学期之间的假期。现在我们自由了，所有的时间都由我们自己支配。早上我们醒来时，不再是因为扫帚打到屁股上，也不是因为妈妈们冲着我们吼叫“起床！起床，你这个懒骨头！”。

公鸡醒来时，我们也醒了，但我们还是躺在床上，听着狗儿们张着大嘴打呼噜。我们还留神听着蚊子的动静，比起红种人和叛军，我们更怕蚊子。

我们学会偷听父母的谈话——虽然有些事情我们自己也能看得出来。我们习惯了红种人的直升飞机绕着山峰在云里飞进飞出的嗡嗡声。这会儿，我们看见直升飞机排成一条直线朝大海飞去。直升飞机飞到某个地点，然后好像忘了什么东西似的，又掉转机头飞回来。直升飞机掉头的地方是远方的一个点，我们是看不见他们把人扔出去的。不过我们听说是这样的。红种人把抓到的叛乱分子从直升飞机敞开的舱门

扔出去。只要我们一走近,我们的妈妈和爸爸立刻不说话了,于是我们就知道又发生了新的暴行,我们只是不知道其中的细节。

几个星期过去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时间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的时间就是用来等待的。我们等着,等着红种人的兵,等着叛军。不管是谁先到我们村子,在他们到来之前,等待的时间很长很长。不过我知道他们进入我们村子的确切日期,因为这是我决心要做的事情——记下时间。红种人第一次进入我们村子是在我十四岁生日的前三天。四个星期以后,叛军来了。后来那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泡泡眼”和他的妻子格雷斯又走进了我们的生活。